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挫败感和人生意义感的作用

作者：胡义秋，曾子豪，彭丽仪，王宏才，刘双金，杨琴，方晓义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使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探究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对抑郁等的综合影响，主题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和新颖性。

回应：感谢审稿老师的评阅与肯定！

意见 1：关于亲子关系得分，作者使用父、母二者的均值，值得商榷。亲子关系和亲子教育具有补位的特征，一是“一高一低”和“两个中等”的均值一样，对初中生抑郁等问题的影响可能不一样，二是孩子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不一样，可能还有性别差异。建议分开来分析，或者依据相关理论和数据，阐述处理的依据。

回应：为了更好地回答评审老师所提出的疑问、避免我们对问题存在误解，请允许我们首先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梳理一下这一修改意见中可能包含的几点疑问：①亲子关系得分使用父、母二者的均值是否合理？②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中，“一高一低”和“两个中等”的均值得分一样，但对初中生抑郁等问题的影响可能不一样。③孩子与父、母所测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不一样，为何这样选择？④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对不同性别的孩子可能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

①亲子关系得分使用父、母二者的均值是否合理？

首先本研究使用的亲子亲密度量表(Parent-child Intimacy Questionnaire)在大量研究中均使用父母均值作为亲子关系得分，如 Bi(2021)对兄弟姐妹关系对公民参与的调查、聂瑞虹等人(2017)在探究人际关系与高中生内外化问题、凌辉等人(2018)在调查小学生亲子关系与校园欺凌的关系研究、范兴华和范志宇(2020)在调查亲子关系与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感的研究，以上研究均使用父母均值作为亲子关系得分，其次下表为父母亲子关系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结果现实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中未将二者独立检验，而使用均值作为亲子关系

得分，并在文中进行了说明“以往研究多以二者均值作为亲子关系得分(Bi et al., 2021)，并且配对样本 t 检验得分显示未发现显著差异($M \pm SD$ 父子 = 30.27 ± 8.40 , $M \pm SD$ 母子 = 30.28 ± 8.39 , $t = 0.01$, $p = 0.99$)。”

	分组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i>t</i>
亲子关系得分	父子关系	930	30.27	8.40	0.01
	母子关系	930	30.28	8.39	

Bi, S. S., Lam, C. B., & Chung, K. K. H. (2021).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civic engage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young ad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6(1), 138-142.

范兴华, 范志宇. (2020). 亲子关系与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感: 心理资本的中介与零花钱的调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03), 624-627+632.

聂瑞虹, 周楠, 张宇驰, 方晓义. (2017). 人际关系与高中生内外化问题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6), 708-718.

凌辉, 李光程, 张建人, 皮丹丹, 黎任水. (2018). 小学生亲子关系与校园欺凌: 自立行为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6), 1178-1181.

②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中，“一高一低”和“两个中等”的均值得分一样，但对初中生抑郁等问题的影响可能不一样。

感谢评审老师指出了这一重要问题，本研究选择了家庭生态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的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正是因为考虑到以往有关研究往往采取简单的总分相加，或者按照某一比例加权后求和，很容易出现评审老师所指出的问题即，“一高一低”和“两个中等”的均值得分一样。而响应面分析在处理变量一致性研究问题时可以更加深入并详细展示两个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即在本研究中分成四种情况：一，一致情况(congruence)①高亲子关系和高教育卷入的“安全”状态和②低亲子关系和低教育卷入的“高危”状态；二，不一致情况(in-congruence)③高亲子关系和低教育卷入和④低亲子关系和高教育卷入状态。并通过检验不一致斜率和选点法证明相比于低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高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挫败感，从而发现了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这一特殊“亲子之间人际关系”的特殊的交互作用，这也是响应面分析的在处理一致性问题的优势所在。

③孩子与父、母所测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不一样，为何这样选择？

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的确，我们在选择变量时也考虑过使用父母体验到的亲子关系和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去检验二者的共同影响，然而在仔细考虑后选择了父母教育卷入这样因素去替换以往父母体验到的亲子关系。首先：有研究表明，父母体验的亲子关系与孩子体验的亲子关系并不一致，张丰等人(2017)发现幼儿越依赖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父母感知的亲子关系就越好，但幼儿感知到的亲子关系却越差，因此孩子与父母体验到的亲子关系往往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甚至父母体验的亲子关系较好但孩子却并不这样认为。其次，父母单方面自我报告亲子关系可能出现较大社会赞许性对研究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在课题组和与该校老师商讨后认为采用亲子关系父母问卷难以真实测量出亲子关系，遂采用相对中性化量表父母教育卷入问卷。此外，由于我国“双减政策”的落地，学生学业压力减少，时间也多了起来，有偿支付的校外教育服务“课外补习”也愈发规范，亲子监督、亲子活动和亲子沟通越来越重要，父母教育卷入程度可以显著预测孩子健康成长。因此本研究选择父母教育卷入这一即具理论基础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因素。而且，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Kaplan & Seginer, 2015; 高燕, 2016; 罗良, 2011)。

Kaplan Toren, N., & Seginer, R. (2015). Classroom climate,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 school functioning in early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8(4), 811-827.

高燕. (2016). 父母教育卷入对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教育测量与评价*, (12), 40-46.

罗良. (2011). 儿童青少年发展中的父母教育卷入.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 21-28.

张丰, 康一奇, 徐娟, 马文雯, 吴南. (2017). 幼儿手机/iPad 使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C]//. 第二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学与国民心理健康摘要集. 1246-1247.

④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对不同性别的孩子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

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亲子关系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的确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但同时有研究也显示亲子关系不受性别的调节(刘玲玲, 2019)。其次，为探究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对不同性别的孩子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将不同性别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下(并添加在附录材料)：

男生组：

结果显示，在统一尺度后，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一致的样本比例为 32.73% (164 名)，亲子关系大于父母教育卷入的样本比例为 34.13% (171 名)，亲子关系小于父母教育卷入的样本比例为 33.13% (166 名)。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沿一致线($PR = ED$)，横截面的

斜率(slope, S)显著($S = -5.20, p < 0.01$), 说明相比于低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 高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沿不一致线($PR = -PI$), 横截面的斜率显著($S = -2.77, p < 0.01$), 选点法的结果显示 $Z1(1.25, 1.25, 26.12)$, $Z2(-0.93, -0.93, 37.38)$, $Z3(1.25, -0.93, 28.50)$, $Z4(-0.93, 1.25, 35.17)$ 。计算 $z\text{-hat}$ 值, 一致线 $Z1$ 和 $Z2$ 的差为 -11.26 ($p < 0.01$), 95% 的置信区间为 $[-14.45, -7.73]$, 不一致线 $Z3$ 和 $Z4$ 的差为 -6.67 ($p < 0.01$), 95% 的置信区间为 $[-10.79, -2.96]$, 结果与全体被试一致。

女生组:

结果显示, 在统一尺度后, 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一致的样本比例为 30.77% (132 名), 亲子关系大于父母教育卷入的样本比例为 35.20% (151 名), 亲子关系小于父母教育卷入的样本比例为 34.03% (146 名)。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 结果显示沿一致线($PR = EI$), 横截面的斜率(slope, S)显著($S = -4.05, p < 0.01$), 说明相比于低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 高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沿不一致线($PR = -PI$), 横截面的斜率显著($S = -3.86, p < 0.01$), 选点法的结果显示 $Z1(1.27, 1.27, 27.92)$, $Z2(-0.89, -0.89, 37.27)$, $Z3(1.27, -0.89, 28.41)$, $Z4(-0.89, 1.27, 36.56)$ 。计算 $z\text{-hat}$ 值, 一致线 $Z1$ 和 $Z2$ 的差为 -9.34 ($p < 0.01$), 95% 的置信区间为 $[-12.47, -6.68]$, 不一致线 $Z3$ 和 $Z4$ 的差为 -8.15 ($p < 0.01$), 95% 的置信区间为 $[-11.70, -5.00]$, 结果与男生组相差不大, 且与全体被试一致, 由此未将二者分组讨论。

刘玲玲, 田录梅, 郭俊杰. (2019).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2), 210-218.

意见 2: 写作和表达有比较多的问题, 需要仔细校对, 如表 2 呈现了 3 个不同数据的表格, 请说明。表二中变量编码和备注中变量的等级编码混淆不清, 需要仔细校对修改。[详细意见]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细心指导, 对于写作和表述的问题, 已请 5 位心理学从业者进行挑剔性阅读, 并将修改在文中以蓝色字体呈现, 有关表 2 变量编码和备注等问题, 对其进行再次修订以满足准确性的表达, 再次感谢您宝贵的意见与指导, 谢谢!

.....

审稿人 2 意见:

本研究关注青少年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和抑郁、自杀、自伤的关系, 统计手段较为繁杂, 存在以下问题需要澄清:

意见 1：背景综述部分 1. 理论背景部分对亲子关系-父母教育卷入的匹配的论述不够充分，探究这两个变量的匹配有何理论基础或现实意义。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有关亲子关系-父母教育卷入的匹配的确一个是比较关键的问题。请允许我们为何选择“亲子关系-父母教育卷入”这两个变量进行匹配做一解释。正如文中所示家庭是与个体最为相关且影响最大的环境，而亲子关系则是家庭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往研究往往选择单视角分析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Bradford et al., 2017; Howard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21)，然而由于家长与孩子身份的差异，二者体验到亲子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存在甚至存在负相关(张丰，2017)。而父母教育卷入(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是“父母对自己孩子教育的期望和态度，以及在家庭和学校中做出的促进孩子取得更好学业成就和心理发展的多种行为”(罗良等, 2014)，高水平的教育卷入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学业成就感以及心理健康水平(Benner et al., 2016; Cheung & Pomerantz, 2011)。此外，由于我国“双减政策”的落地，学生学业压力减少，时间也多了起来，有偿支付的校外教育服务“课外补习”也愈发规范，亲子监督、亲子活动和亲子沟通越来越重要，父母教育卷入程度可以显著预测孩子健康成长。因此本研究选择父母教育卷入这一即具理论基础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因素，作为父母视角，与孩子体验的“亲子关系”综合探究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不仅如此，由父母单方面自我报告亲子关系可能出现较大社会赞许性对研究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在课题组和与该校老师商讨后认为采用亲子关系父母问卷难以真实测量出亲子关系，遂采用相对中性化量表父母教育卷入问卷。

综上，我们在文中也对亲子关系-父母教育卷入的匹配的论述进行了修改，“在一项调查马里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社会创造力的研究中，Diarra 等人(2017)发现教育卷入水平较高的父母重视为孩子营造自主学习的良好家庭教育氛围，孩子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自由探索，具有更高的创造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2021 年 9 月 1 号我国“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学生学习压力减少以及有偿支付的校外教育服务“课外补习”也愈发规范，孩子可支配时间更多，亲子沟通、亲子活动和亲子监督越来越频繁与重要，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身心发展影响更大”，再次感谢评审老师指导！

罗良, 吴艺方, 韦唯. (2014). 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的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53-60.

张丰, 康一奇, 徐娟, 马文雯, 吴南. (2017). 幼儿手机/iPad 使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C]//. *第二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学与国民心理健康摘要集*. 1246-1247.

Benner, A. D., Boyle, A. E., & Sadler, S. (2016).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success: The

- roles of prior achieve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6), 1053-1064.
- Bradford, A. B., Burningham, K. L., Sandberg, J. G., & Johnson, L. N. (201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 roles of attachment and perceived spouse attachment behavior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3(2), 291-307.
- Cheung, C. S. S., & Pomerantz, E. M. (2011).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academic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82(3), 932-950.
- Diarra, Y., Gu, C., Guo, M., & Xue, Y. (2017). The Effect of So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s' Rearing Behavior on Social Creativity of Children in Mali. *Creative Education*, 8(6), 829-846.
- Howard, K. R., Reinecke, M. A., Lavigne, J. V., Gouze, K. R., & Jordan, N. (2019). Marital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during treatment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Child-driven and bidirectional effec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7(11), 1841-1850.
- Wang, J., Wang, H., Lin, H., Richards, M., Yang, S., Liang, H., ... & Fu, C. (2021). Study problem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po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 a vulnerability.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17(1), 1-9.

意见 2：2.1.2 中挫败感和抑郁、自杀自伤的关系论述充分，但是亲子关系-教育卷入和挫败感的关系论述薄弱。这里不仅包含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单独的作用，还包含了匹配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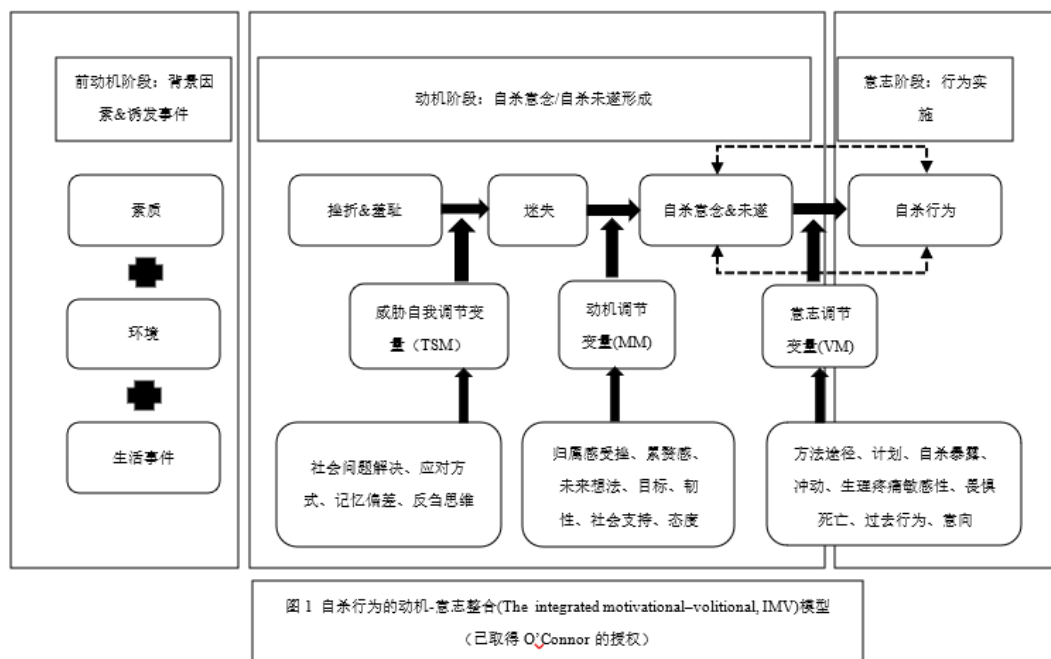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和宝贵意见。有关亲子关系-教育卷入和挫败感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论文有些不足，因此我们增加相关陈述“Zortea 等人(2019)使用解释性现象学分析方法对 9 名企图自杀者半结构式面对面访谈，结果显示不良的亲子依恋可以通过挫败感、受困感和归属受挫等增加个体自杀想法与行为，而且受到尊重、关怀等可以提高个体复原力从而减低其消极影响”

我们在查阅 web of science, PubMed, CNKI 和万方等数据库后，暂未发现有关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匹配研究。但是在一项有关父母低头症(phubbing)和孩子低头症匹配对青少年抑郁发展的影响研究中，结果显示家长和孩子低头症匹配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展。随着父母与青少年低头症之间差异的增加，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会减少。Van Petegem 等人也发现在调查母亲-孩子对母亲过度保护养育方式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和母亲对过度保护性养育的评分越高，就越容易出现适应不良和更多的需要挫败感，且青少年和母亲报告之间的不一致与更多的外化问题以及挫折有关，尤其是当青少年认为比母亲报告的过度保护水平更高时。再次感谢评审老师意见！

- Bai, Q., Lei, L., Hsueh, F. H., Yu, X., Hu, H., Wang, X., & Wang, P. (2020). Parent-adolescent congruence in phubbing and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A moderated polynomial regression with response surface analyse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5, 127-135.
- Van Petegem, S., Antonietti, J. P., Eira Nunes, C., Kins, E., & Soenens, B. (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psychological need frustration: A multi-informant study using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9(1), 162-177.
- Zortea, T. C., Dickson, A., Gray, C. M., & O'Connor, R. C. (2019). Associations between experiences of disrupted attachments and suicidal thoughts and behaviours: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35, 112408.

意见 3: 人生意义感是否也可能是挫败和抑郁、自杀自伤的中介变量？是调节还是中介更为合适？

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有关人生意义感为何在本研究中作为一个调节变量而非中介变量，请容我们做以下陈述。首先在本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动机-意志整合模型 (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model, IMV) 明确指出，挫败感到心理危机的发展受到调节因素的影响，具体见下图(为作者本人根据 O'Connor 翻译，并取得其正式文字授权)。而人生意义感作为一种对个体对其当下所拥有的生命意念和价值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追寻，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动机调节变量。此外，许多研究显示人生意义感可以调节外界压力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如 Pulpulos (2018) 发现在控制年龄、性别、体重指数、教育和种族等因素后，人生意义感低水平个体的感知压力与低水平的皮质醇浓度显著相关，而在人生意义感高水平个体中未发现这种相关性。Marco 和 Alonso (2019) 的研究也显示人生意义感缓冲了临床焦虑或负面影响与日常生活的整体适应不良之间的关联。不仅如此，上述回应中，Zortea 等人(2019) 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亲子依恋可以通过挫败感、受困感和归属受挫等增加个体自杀想法与行为，而且受到尊重、关怀等可以提高个体复原力从而减低其消极影响。而人生意义感作为一种重要信念与动机因素，也可以提高个体应对压力能力。因此，本研究中将人生意义感作为调节变量并探究其在挫败感对心理问题之间的缓冲效应。再次感谢评审老师的意见！



Ellis, K. R., Janevic, M. R., Kershaw, T., Caldwell, C. H., Janz, N. K., & Northouse, L. (2017). Meaning-based coping, chronic condi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dvanced cancer & caregiving. *Psycho-oncology*, 26(9), 1316-1323.

Marco, J. H., & Alonso, S. (2019). Meaning in life buffer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linical anxiety and global maladjustment in participants with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on sick leave. *Psychiatry Research*, 271, 548-553.

Pulopulos, M. M., & Kozusznik, M. W. (2018).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diurnal cortisol. *Stress*, 21(3), 203-210.

意见4:图1的理论假设模型中建议体现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的匹配关系。方法和结果部分1.样本仅为湖南一所学校中学生,且仅为初一初二学生,取样较为单一,代表性可能有限。: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有关样本代表性问题的确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话题。请容我们做如下说明,首先本研究采用的响应面分析需要学生和家长匹配数据,如非学校十分配合难以获得此项数据,本研究中被试学校为课题组长期合作学校,在进行调研前与学校领导进行了深入的洽谈,并获得的大力的支持,在家长问卷收集过程中得到各班班主任全力支持,在保证匿名与有效性的条件下获得较好的数据,在充分考虑初三学生面临的升学压力,课题组与学校领导和心理健康中心老师探讨后决定不参与调研,这也是研究遗憾和不足之处。其次,如文中所示“独生子女491(52.8%)名,非独生子女439(47.2%)名;父母的婚姻状况其中初婚777(83.5%)名,离异47(5.1%)名,再婚31(3.3%)名,其他类型75(8.1%)名;家庭经济水

平其中很好 128(13.7%)名, 较好 530(57.0%)名, 一般 234(25.2%)名, 不太好 16(1.7%)名, 非常不好 22(2.4%)名。”在上述人口学变量上, 各个类型占比较好。最后, 我们认为这的确是研究不足之处, 因此我们在文中进行了相关陈述“且本研究被试为一所学校的初二初三学生, 在样本代表性方面存在不足, 我们计划在之后的研究中采用更大的样本量使用多时间点的追踪数据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进行探究。”, 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意见 5: 为何家长问卷收集需要一周后, 在整理出反馈之后再行, 是否家长获得了学生报告后进行的?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 具体流程安排是由于一周内紧急整理问卷和撰写反馈是向学校表达合作的态度与决心, 由于匹配的难度, 在正式实验前也在另一个学校进行了试点性检验, 但发现家长问卷大多存在较大的问题, 比如重要信息的缺失和错误、无效问卷较多(同一选项或“Z”字选项等), 在总结经验和前期多次洽谈后开展了实验。由于反馈是合作重要内容, 因此我们通过一周内紧急整理问卷和撰写反馈也是向学校表达态度以获得更坚实的支持, 家长是在未获得学生报告的情况下进行问卷收集。再次感谢您的意见!

意见 6: 学生和家长问卷因为要匹配, 是否非匿名, 如何确保准确性?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的确, 由于匹配机制的存在, 在确保匿名的情况下, 准确性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正如上一回应所示, 我们在正式实验前在另一个学校进行了试点性检验, 再多次商讨后, 我们选择以让学生填写出生日期, 具体题目设置为:

你的生日: _____ (使用四位数字, 如 1 月 29 号填 0129)

此外, 为降低学生防备心, 在该题项前设置“迷惑性”选项:

你的星座: _____

然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匹配, 对于未匹配人员将问卷由班主任辨识, 力求准确和有效。但对于难以匹配问卷选择放弃, 因此问卷总体有效回收率为 82.8%。

意见 7: 统计分析方法应该在“2 方法”中具体描述。否则不清楚的读者对多项式结合响应面分析, 以及有调节的中介多项式一头雾水。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这的确是一个我们忽视的问题, 现已对相关方法进行详细的描述如下“在有关(不)一致研究方法, 常规的差异分数法与剖面相似指数会错误的提高假设的阳性结果(Humberg et al., 2019), 本文采取能够提供更加精确结果的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方法, 克服了这一限制, 而且呈现出三维图谱可以描绘两个变量不同匹配关系对因变

量的效应,使得结论更直观(Shanock et al., 2010)。根据 Edwards 和 Parry (1993)提出的模型公式,本文建构的模型公式为: $Z(\text{挫败感}) = b_0 + b_1(PR) + b_2(EI) + b_3(PR)^2 + b_4(PR) \times (EI) + b_5(EI)^2 + e$ 。其中 PR 表示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 EI 表示父母的教育卷入行为; $(PR) \times (EI)$ 为二者交叉项;加上二者的平方项; b_0 代表了截距; b_1 为 PR 的系数; b_2 为 EI 的系数; b_3 为 PR^2 的系数, b_4 为交叉项的系数; b_5 为 EI^2 的系数; e 为误差项。本文首先对测量指标 PR 与 EI 进行度量中心化处理,再将各项进行回归,并通过绘制三维图形将结果呈现。在三维图形中,我们主要通过计算“ $PR = EI$ ”匹配曲线的斜率 $a_1 = b_1 + b_2$ 和曲率 $a_2 = b_3 + b_4 + b_5$ 的值以及“ $PR = -EI$ ”的不匹配曲线的斜率 $a_3 = b_1 - b_2$ 和曲率 $a_4 = b_3 - b_4 + b_5$ 的值及其显著性来判断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其次有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上述多项式回归系数和构建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的块变量(block variable, Edwards & Cable, 2009),进而以块变量为自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法,考察块变量(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挫败感的中介效应以及人生意义感对该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并构建三个方程。方程 1 估计自变量块变量对因变量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预测;方程 2 估计块变量对中介变量挫败感的预测;方程 3 估计调节变量人生意义感对挫败感与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块变量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残余效应检验,标准化处理所有连续变量。”再次感谢评审老师的细心指导!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竞争还是替补?. *心理学报*, 46(5), 714.

Edwards, J. R., & Cable, D. M. (2009). The value of value congrue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4(3), 654.

Edwards, J. R., & Parry, M. E. (1993). On the use of polynomial regression equations as an alternative to difference score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6), 1577-1613.

Humberg, S., Nestler, S., & Back, M. D. (2019).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Checklist and clarifications for the case of congruence hypothes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0(3), 409-419.

Shanock, L. R., Baran, B. E., Gentry, W. A., Pattison, S. C., & Heggstad, E. D. (2010). Polynomial regression with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A powerful approach for examining moderation and overcoming limitations of difference scor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5(4), 543-554.

意见 8: 本研究中 PR 和 EI 是两个不同的构念,且具有不同的测量尺度,多项式结合效应面

分析一致性效应需要统一两个自变量的测量尺度，使得 PR=EI 表达的是一致或者匹配，那么本研究采用了何种方法统一尺度？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将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回答见下一回应(6)。

再次感谢评审老师的意见！

意见 9：统一尺度后，作者首先分析了一致，两种不一致的比例，请问是以何种标准界定一致和不一致？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有关匹配的必要性，尽管有些一致性的实证研究未进行(不一致样本比例的描述(Cole et al., 2013; Zhang et al., 2012; 梁彦清 & 刘伟鹏, 2020; 马丽 & 马梦媛, 2019)。然而我们仍然相信 Shanock 等人(2012)的建议，在运用多项式回归分析与响应面分析前，应先描述样本(不)一致比例，以确保一致性研究更具价值前提。

有关(不)一致线样本比例分析具体操作步骤如下(Fleenor et al., 2012)：将匹配变量(文中亲子关系(PR)和教育卷入(EI))均进行标准化处理(ZPR、ZEI)，如何对每一样本对应的 ZPR 和 ZEI 的差值结果进行样本归类。如 $|ZPR - ZEI|$ 小于或等于 0.5，则样本归于“PR 和 EI 一致”类型；如果 $|ZPR - ZEI|$ 大于 0.5，则样本归于“PR 和 EI 不一致”类型，其中根据 ZPR 和 ZEI 的差值大于或小于 0.5，又可细分为“高于”和“低于”比例。

且只有在“样本比例超过或含 10%”继续使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才更具实践价值(Shanock et al., 2012)。

梁彦清, 刘伟鹏. (2020). 领导—成员交换一致性 with 员工创新绩效——基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的分析.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3, 64-69.

马丽, 马梦媛. (2019). 匹配还是不匹配? 需求-资源动态关系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1.

Cole, M. S., Carter, M. Z., & Zhang, Z. (2013). Leader-team congruence in power distance values and team effectivene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climat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8(6), 962.

Fleenor, J. W., McCauley, C. D., & Brutus, S. (1996). Self-other rating agreement and leader effectivenes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7(4), 487-506.

Shanock, L. R., Baran, B. E., Gentry, W. A., Pattison, S. C., & Heggstad, E. D. (2010). Polynomial regression with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A powerful approach for examining moderation and overcoming limitations of difference scor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5(4), 543-554.

Zhang, Z., Wang, M. O., & Shi, J. (2012). Leader-follower congruence in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work outcomes:

意见 10: 多项式结合相应面分析的前提条件是, 加入更高阶的二次项和交互项之后, 解释量显著改善, 即一致或者不一致有显著的效应, 否则即使系数显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此在进行响应面分析前应该考虑是否满足条件。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有关效应现实性意义的确未有很好的陈述, 因此我们绘制了多项式回归模型系数以及匹配一致性线和不一致线的斜率和曲率结果(见附录)或下表。此外有关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前提条件, Humberg 等人(2019)指出还需要 1)确保预测因子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足够低, 为此表 2 列出各变量 VIF 值, 各回归项 VIF 较好(小于 4)不存在明显共线性问题。2)样本应具有较高的效应力, 理想情况下, 这应该通过在各自己的模拟研究中确定必要的样本大小, 或至少主效应的 2~3 倍的被试参与。为此以 0.1 效果量为基础, 采用 G*Power 3.1.9.7 软件进行分析, 若要满足 Cohen $d > 0.8$ 的高效果量 (Cohen, 1988), 大约需要 134 人, 以 2-3 倍的被试对象为(268~402)人, 本研究被试为 930 人满足其要求。

附表 1 亲子关系-教育卷入匹配与挫败感多项式回归结果

变量	方程 1 ($R^2 = 0.027$)	方程 2 ($R^2 = 0.151$)	方程 3 ($R^2 = 0.152$)
截距	26.47	45.90	27.75
控制变量			
性别	0.57	1.09	1.10
是否独生子女	0.26	-0.67	-0.69
父母婚姻状况	0.62	0.47	0.49
家庭经济水平	2.19**	1.73***	1.72***
匹配变量			
PR		-3.50***	-3.88***
EI		-0.47	-0.49
PR2			-0.26
PR*EI			0.03
EI2			0.04
响应面特征			
匹配曲线			
斜率		-4.37***	
曲率		-0.18	
不匹配曲线			
斜率		-3.39***	
曲率		-0.25	

变量	性别	是否独 生子女	父母婚 姻状况	家庭经 济水平	PR	EI	PR2	PR*EI	EI2
VIF 值	1.75	1.61	1.48	1.35	1.41	1.03	1.03	1.02	1.02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Routledge.

Humberg, S., Nestler, S., & Back, M. D. (2019).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Checklist and clarifications for the case of congruence hypothes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0(3), 409-419.

意见 11：图 2 想要呈现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同颜色应该是指代不同水平的父母教育水平，从图中根本看不出关系。此外，为何图例上同一水平的父母教育如 1.6 有两种颜色？建议采用三维响应面呈现。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在提交版本中本应是提交的清晰的三维响应面图矢量图，但由于 word 文档的原因您所见到的可能是有差异的图。这是我们未考虑的情况，先已提供清晰的三维响应图，为我们的疏忽给您带来的不好的阅读体验致歉。再次感谢您的细心审查！

意见 12：本研究的中介方法采用块变量处理，无法解释不同比较情况下的中介效应，是否采用构造两个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参考：陶厚永, 曹伟. (2020). 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的原理及应用. 统计与决策, (8), 36-40. 10. 父母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为多分类变量，作为协变量是如何处理的？学生年龄是否需要控制？另外，控制变量应该在一开始的多项式回归中就纳入。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指导。我们仔细查阅了陶厚永和曹伟老师的论文，对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有着更加清晰了解，对其理论基础与应用实践有着更进一步的认识。父母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为多分类变量，但是为有顺序的多分类变量，将其直接纳入方程中考虑(见回应 7)，类似的做法在大量的研究中已经出现如刘昕和曾琦(2021)、马丽和马梦媛(2019)、汪金爱和王铁民(2015)、于维娜等人(2015)的研究。

1) 学生年龄是否需要控制？

有关年龄的控制，的确青少年心理问题类型和程度与年龄有着一定的相关，在控制变量的纳入时考虑过是否应将年龄纳入控制，但本研究中仅纳入初一初二学生，年龄跨度太小，对于影响不大，因此未纳入其中，但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拟以更大的样本、更具代表性以及年龄跨度更大的群体为被试开展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影响。再

次感谢您的细心指导！

2) 控制变量应该在一开始的多项式回归中就纳入。

可能是由于没有直接列出多项式回归模型系数，因此对您造成了阅读上的误会，但我们在多项式回归时已将控制变量纳入，并且在有调节的中介分析中进行了相关的称述“由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将性别、是否独生、父母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水平纳入分析”。但仍是可能会造成读者的误会，现已将多项式回归模型纳入附录以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刘昕, 曾琦. (2021)工作负担为何不一定削弱组织认同感?——基于工作负担和工作回报的响应面分析. *经济与管理研究*, 42(03), 111-127.

马丽, 马梦媛. (2019). 匹配还是不匹配? 需求-资源动态关系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6(11):19-32.

汪金爱, 王铁民. (2015). 中高层管理者自评-他评一致性成因及其组织影响研究. *经济科学*, 3, 114-127.

于维娜, 樊耘, 张婕, 门一. (2015). 需求-供给契合对组织认同影响的差异性研究. *管理科学*, 28(06), 65-79.

意见 13：抑郁、自伤、自杀之间存在相关，为何不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而拆分成不同模型？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青少年抑郁、自伤与自杀意念的确存在较高的，但三者在其概念内涵、操作定义与危机程度方面均有着不同意义。此外从数据结果看，三者的确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不论是中介模型中的中介效应量与占比，还是调节模型中的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均有着差异，且当人生意义感在正 1.65 个标准差和 3.15 个标准差时，挫败感对青少年自伤和自杀意念的预测不显著，因此未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分析。其次，有关三个不同连续变量作为结果变量在同一模型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查阅许多文献后未发现类似的方法，我们在努力学习和查阅后难以实现这一方法。再次感谢评审老师的指导！

意见 14：不管是亲子关系还是教育卷入都有学生知觉和父母知觉两个不同的视角，为何亲子关系是学生视角，教育卷入是父母视角？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

1)为何亲子关系是学生视角？

本研究被试为初一初二学生，而初中是青春期的萌芽阶段，也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Kaneita et al., 2009)，以往研究表明许多心理问题与风险在进入青春期后迅速提升。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分，对个体的发展有很大影响(Cairns et al., 2014; Hazel et al., 2014)。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一直研究者受到重大关注，此外在作者众多实践调查中，如对某省 20 名青少年自杀事件心理解剖、全省重点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调研以及在对本研究被试高危群体（心理问题得分排名前 5%）的访谈调查中，亲子关系作为是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虽然亲子关系对父母和家长均有影响，但孩子特殊的角色以及年龄特征，亲子关系对孩子发展影响更为深远与重大，因此本研究选择从孩子视角的亲子关系探究其影响。其次，有关孩子视角的教育卷入行为研究较少，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因此我们计划在未来的研究将探究孩子教育卷入行为影响机制。

2)为何父母视角是教育卷入

首先一方面由于本研究探究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然而由于家长与孩子身份的差异与现实地位的不同，因此父母对亲子关系的认知往往是不符合或不准确的，二者体验到亲子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存在甚至存在负相关，例如在一项探究幼儿手机依赖与亲子关系的研究中，张丰等人发现幼儿越依赖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父母感知的亲子关系就越好，但幼儿感知到的亲子关系却越差。父母认为满足孩子的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使用需求即是他们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但孩子并没有感受到来自父母的亲子爱意，父母与幼儿感知的亲子关系存在差异。而父母教育卷入(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是“父母对自己孩子教育的期望和态度，以及在家庭和学校中做出的促进孩子取得更好学业成就和心理发展的多种行为” (罗良等, 2014)高水平的教育卷入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学业成就感以及心理健康水平(Benner et al., 2016; Cheung & Pomerantz, 2011)。此外，由于我国“双减政策”的落地，学生学业压力减少，时间也多了起来，有偿支付的校外教育服务“课外补习”也愈发规范，亲子监督、亲子活动和亲子沟通越来越重要，父母教育卷入程度可以显著预测孩子健康成长。因此本研究选择父母教育卷入这一即具理论基础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因素，且教育卷入是一个相对来说中性与实际调查反应，父母正式作答的概率更高。

罗良. (2011). 儿童青少年发展中的父母教育卷入.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 21-28.

张丰, 康一奇, 徐娟, 马文雯, 吴南. (2017). 幼儿手机/iPad 使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C]//*第二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学与国民心理健康摘要集*. 1246-1247.

Benner, A. D., Boyle, A. E., & Sadler, S. (2016).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success: The roles of prior achieve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6), 1053-1064.

Cheung, C. S. S., & Pomerantz, E. M. (2011).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academic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82(3), 932-950.

Cairns, K. E., Yap, M. B. H., Pilkington, P. D., & Jorm, A. F. (2014).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depression that adolescents can modif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69, 61-75.

Hazel, N. A., Oppenheimer, C. W., Technow, J. R., Young, J. F., & Hankin, B. L. (2014). Par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buffers against the effect of peer stressor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middle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8), 2115.

Kaneita, Y., Yokoyama, E., Harano, S., Tamaki, T., Suzuki, H., Munezawa, T., ... & Ohida, T. (2009). Associations between sleep disturbance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Jap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leep medicine*, 10(7), 780-786.

意见 15：多项式回归模型（先纳入线性，再纳入高阶）系数以及匹配一致性线和不一致线的斜率和曲率结果建议呈现，可放于附录中。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现已将多项式回归模型纳入附录中，此外亦可在回应 8 中查询。感谢您的指导！

意见 16：3.3 只关注匹配（一致），并不关注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的主效应，3.4 的块变量却是包含主效应及匹配的综合自变量，因此要厘清前后的关系，以及本研究主要探究的问题。

回应：感谢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有关该条意见请容我们做一下陈述，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是探究(不)一致的问题的新兴流行方法(Edwards & Parry, 1993)。运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法进行(不)一致性效应研究，不仅能够放松传统差异分数法对回归方程的诸多限制、有效克服差异分数法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还能通过响应面图及其重要特征的数据估计，既十分直观地展示出复杂的三维关系，又挖掘出传统差异分数法舍弃掉的或直接测量法无法测量出的更多有关(不)一致性效应的深层信息，非常值得在(不)一致性效应研究的诸多领域进行引入和推广(张海燕，张正堂, 2017)。而有关(不)一致变量以多项式回归系数为依据构造块变量，进而进行中介或调节分析的研究也较多如：孔茗等(2017)、李树文和罗瑾琰(2021)、陶厚永和曹伟(2021)、王汉瑛等(2021)、张海燕和张正堂(2017)。均使用(不)一致变量构建块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

然而我们仔细思考后也认为的确可能会忽视主效应，不能全面阐释变量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我们将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单独构建方程分析其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

响，见下表(并添加附录)。

变量	心理问题类型		
	抑郁	自伤	自杀意念
性别	0.12 [*]	0.14 ^{***}	0.14 ^{***}
是否独生	0.01	0.01	0.00
婚姻状况	0.05	0.07	0.03
家庭经济水平	0.08 [*]	0.04	0.03
亲子关系	-0.42 ^{***}	-0.27 ^{***}	-0.36 ^{***}
教育卷入	0.02	-0.04	-0.09 ^{***}
R ²	0.20	0.10	0.16
F	35.79	16.87	27.13

孔茗, 袁悦, 钱小军. (2017). 领导—成员喜欢一致性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及其机制. *南开管理评论*, (6), 104-115.

李树文, 罗瑾琰. (2020). 领导-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与员工建言: 内部人身份感知与性别相似性的作用. *心理学报*, 52(9), 1121.

陶厚永, 曹伟. (2020). 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的原理及应用. *统计与决策*, (8), 36-40.

王汉瑛, 邢红卫, 田虹. (2018). 定位绿色消费的“黄金象限”: 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响应面分析. *南开管理评论*, 21(3), 203-214.

张海燕, 张正堂. (2017). 一致性视角解读制度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法. *南大商学评论*, (2), 135-156.

Edwards, J. R., & Parry, M. E. (1993). On the use of polynomial regression equations as an alternative to difference score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6), 1577-1613.

意见 17: 表 2 后续的几个表格应该是针对不同结果变量的，但是没有标题，又不是在同一个三线表中，需要修改格式。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细心指导，对于写作和图表相关的问题，已请 5 位心理学从业者进行挑剔性阅读，并将修改在文中以蓝色字体呈现，有关表 2 变量编码和备注等问题，对其进行再次修订以满足准确性的表达，再次感谢您宝贵的意见与指导，谢谢！

意见 18: 文章中有多个 X 与 Y 指代不同的变量，容易混淆，建议具体变量具体区分。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细心指导，这个问题的确容易减低读者的阅读体验感，对于 X 和 Y 指代的问题，已进一步修订，对其进行再次修订以满足准确性的表达，再次感谢您宝贵的意见与指导，谢谢！

意见 19: 未见有效问卷的识别和筛选，以及缺失数据的处理。讨论部分 1.4.1 的标题不太合

适，最终因变量是抑郁、自杀自伤，挫败感为中介，标题不能体现。2.对匹配的讨论不够深入。教育卷入的主效应本来就比亲子关系的主效应弱，似乎已经能够说明重视亲子关系更重要，而不需要匹配分析，需要突出匹配的意义。3.“挫败感的中介效应也提示，外界压力与应激事件可能是通过引起个体挫败感体验，从而导致相关心理问题与障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并未涉及外界压力和应激事件，这部分的说明需要结合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4.“因此在之后的相关研究或筛查中可以考虑使用挫败感量表进行代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详细意见]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请允许我们对上述意见逐一解释：

1)未见有效问卷的识别和筛选，以及缺失数据的处理

由于孩子与家长匹配数据难以获得，我们有效问卷的筛查主要是来源于能否匹配、以及关键问题(人口学问题一致性)和问卷总体缺失不得超过 5%。有关缺失数据处理问题，由于样本来源于自我报告因此往往存在缺失值，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孩子问卷：变量缺失 0，不完整个案 208(22.37%)，值缺失 649(1.04%)，缺失率较小，家长数据无缺失。当面临缺失数据时，存在许多经典的插补方法，每种方法都存在使用前提或者限制条件，也会有一定的缺点，本研究使用的缺失数据插补方法为：EM 插补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Imputation)。EM 假设数据缺失类型为 随机缺失 (Missing at Random, MAR)，并使用当前数据信息和指定模型对缺失数据进行“最佳猜测” (Bennett, 2001)，是一种基于最大似然 (Maximum Likelihood) 的方法(Schlomer et al., 2010)，适用于连续变量。事实上，EM 插补与回归插补在数学上较为类似，都是使用某些变量对其它变量的回归得出的预测值对缺失值进行插补，但比回归插补更为优秀(现已补充在附录部分)。

2)讨论部分 1.4.1 的标题不太合适，

现已对标题进行修改，且对于写作和表述的问题，已请 5 位心理学从业者进行挑剔性阅读，并将修改在文中以蓝色字体呈现，再次感谢您宝贵的意见与指导。

3)对匹配的讨论不够深入。

4)对于挫败感的影响应结合亲子关系和教育卷入进行谈论。

感谢您的宝贵意义，鉴于上述两个小点均是对于匹配与挫败感的影响，因此请允许我们将二者统一回应。我们增加下列陈述“在一项以 730 名成年人为被试探究过去养育和当前依恋取向的看法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的研究，Zortea 等人(2020)也发现挫败感在消极教育方式与自杀意念中起中介作用，心理韧性缓冲这一中介影响。

然而以往研究往往采用父母或孩子单视角去探究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又或者

测量父母与孩子有关亲子关系得分,却以简单的总分或按某一比例加权求和忽视了父母与孩子身份差异与地位的不对等。在一项父母-青少年对家庭氛围看法匹配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和压力的研究中,结果显示当父母-青少年一致认为家庭混乱时,青少年症状与压力得分最高;而当不一致情况即青少年感知家庭混乱高-父母感知低时,青少年抑郁症状和压力得分最高(Human et al., 2016)。”再次感谢评审老师宝贵的指导!

5)“因此在之后的相关研究或筛查中可以考虑使用挫败感量表进行代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此条陈述的本意是由于在实际调查中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确会对青少年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体验,因此我们希望在有关普查或入学体检可以使用相对中性不会很容易引起个体不适性体验的量表。但仔细思考后这的确是我们做出了过度推测,在实际情况中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我们删除了相关陈述,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Bennett, D. A. (2001). How can I deal with missing data in my study?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5(5), 464–469.

Human, L. J., Dirks, M. A., DeLongis, A., & Chen, E. (2016). Congruence and incongruence in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perceptions of the family: Using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o examine links with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10), 2022-2035.

Schlomer, G. L., Bauman, S., & Card, N. A. (2010). Best practices for missing data management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7(1), 1–10.

Zortea, T. C., Gray, C. M., & O'Connor, R. C. (2020). Perceptions of Past Parenting and Adult Attachment as Vulnerability Factors for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50(2), 515-533.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修改和回答了先前提出的问题, 建议接受发表。

回应: 衷心感谢审稿专家的认可与肯定。稿件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您在审稿过程中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指导!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和修改, 但还有以下意见供参考:

回应: 衷心感谢审稿专家的认可与肯定。您在审稿过程所给我们提出十分有建设性的意见与

指导，不断使我们修改手稿的不足和提高论文写作质量。

意见 1：作者谈及如何让家长问卷和学生问卷都匿名的情况下进行匹配时说，采用了让学生回答生日的方式匹配，是指让同一个班级学生和家長同时回答学生生日，把生日一样的匹配。同一天生日的直接删除，剩下 82.8%，这种处理方式造成的缺失是否会带来偏差？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有关数据筛查的方法课题组在前期探讨和数据处理时期也曾出现过您所提出的问题的类似争执，在仔细商讨后采取了这种方式，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上次回应中所示“以 0.1 效果量为基础，采用 G*Power 3.1.9.7 软件进行分析，若要满足 Cohen $d > 0.8$ 的高效果量 (Cohen, 1988)，大约需要 134 人，以 2-3 倍的被试对象为 (268~402) 人，本研究被试为 930 人满足其要求。”本研究样本较多，因此较少的缺失并不会有着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疏忽，在上次回应时仅对生日这一重要匹配因素声明，但需要澄清的是匹配还包括年龄和性别，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发现同班级，同一天生日，同岁，同性别的孩子确实很少，平均一个班级不到一对。因此综合考虑数据真实性的重要性和较少的样本缺失，我们采取了这种方式。其次还需要声明的是，的确如果以姓名作为匹配变量可能有着最高的准确度和便捷性。但该方式在我们前期讨论中就被集体否决，虽然我们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调查单位的许可以及青少年本人和家長知情同意，但是考虑到数据真实性和学生最小抵触情绪，因此选择这种方式。此外，本研究方法在事后我们给与学校反馈情况显示，进入我们危机库(以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得分前 15%)的孩子大多得到的班主任的认可，且有老师主诉有些危机库的孩子平常表现比较好，但是在其作文和家访中表现出危机行为也进入我们筛查系统中，从而在侧面也印证了数据可信性与准确性！再次感谢您的细致审查！

意见 2：从附表 1 来看，加入二次项和交互项之后，解释量 R^2 只变化了 0.001，说明实际上一致或者不一致对挫败感结果产生的效应微乎其微，意味着响应面分析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本研究中加入二次项和交互项 R^2 变化量较小。但 Humberg 等人(2019)有关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前提条件(1 确保预测因子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足够低；2)样本应具有较高的效应力)，并未指出较小的 R^2 不能进行响应面分析，且张珊珊等人(2012)提出有关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前提条件(1 两个匹配的测量指标只能作为预测变量，而且必须是概念同构；2 两个匹配的测量

指标要用相同量尺的量表来测量; 3 需要满足所有多元回归分析的假设)也未涉及到二次项和交互项的解释量问题, 且这二位学者的其他前提在本次研究中均满足。其次, 本研究中匹配后的样本为 930 份, 相比类似的响应面分析研究如陈倩等人(2022)400 人、付竞瑶等人(2021)287 人、李树文和罗瑾琰(2020)254 人等, 有着更充足的样本量, 虽然 R^2 变化量不大但也有较高解释力。同时, 响应面分析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匹配变量一致与不一致情况不同影响结果, 而在本研究中一致与不一致情况的斜率均显著且结果较好, 还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类似研究在加入二次项和交互项之后亦存在解释量也变化不大的现象(王蓉娟, 吴建祖, 2021; 许民利等, 2020)。但总体来说这是本研究的遗憾与不足, 因此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选取更为有利的变量来探究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非常感谢您的细心指导和意见!

陈倩, 姜道奎, 刘腾. (2022). 忠诚、能力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 *教科学* 1-11

付竞瑶, 张兰霞, 赵建浩, 钱金花. (2021) 员工-主管边界分割偏好匹配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管理学报*, 18(4), 521.

李树文, 罗瑾琰. (2020). 领导-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与员工建言: 内部人身份感知与性别相似性的作用. *心理学报*, 52(9), 1121.

王蓉娟, 吴建祖. (2021). 注意力一致性, 环保约谈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3(4), 42.

许民利, 赵亚南, 简惠云. (2020). 基于任务技术匹配的“互联网+ 回收”价值共创行为研究. *技术经济*, 39(9), 22-30.

张珊珊, 张建新, 周明洁. (2012). 二次响应面回归方法及其在个体-环境匹配研究中的使用. *心理科学进展*, 20(6), 825-833.

Humberg, S., Nestler, S., & Back, M. D. (2019).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Checklist and clarifications for the case of congruence hypothes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0(3), 409-419.

意见 3: 作者提供的三维响应面 (下图) 让人困惑, 首先 X 轴 Y 轴为何不是对称的, Z 轴为何数值如此之大? 也无法判断斜率和曲率, 一致性线和不一致性线。更常见的响应面应该如心理学报文章中例子, 易于读懂和理解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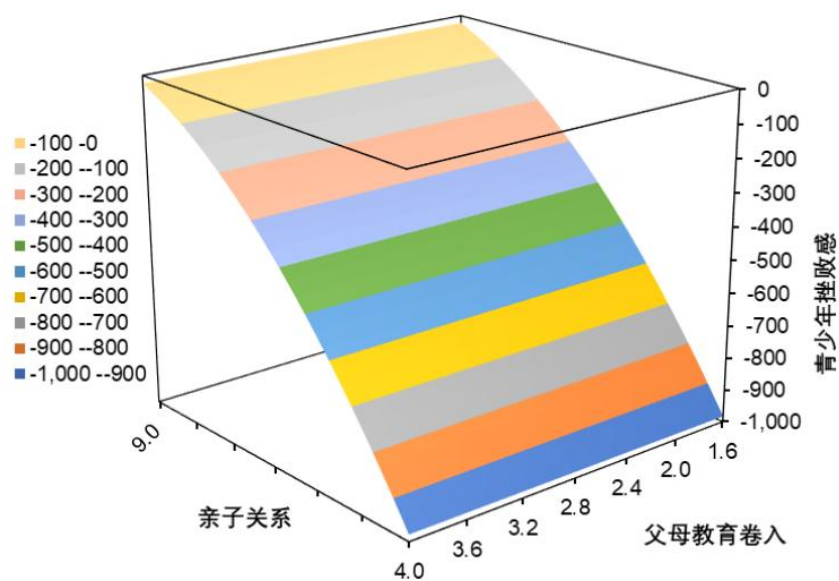


图 1 亲子关系-父母教育卷入一致对青少年挫败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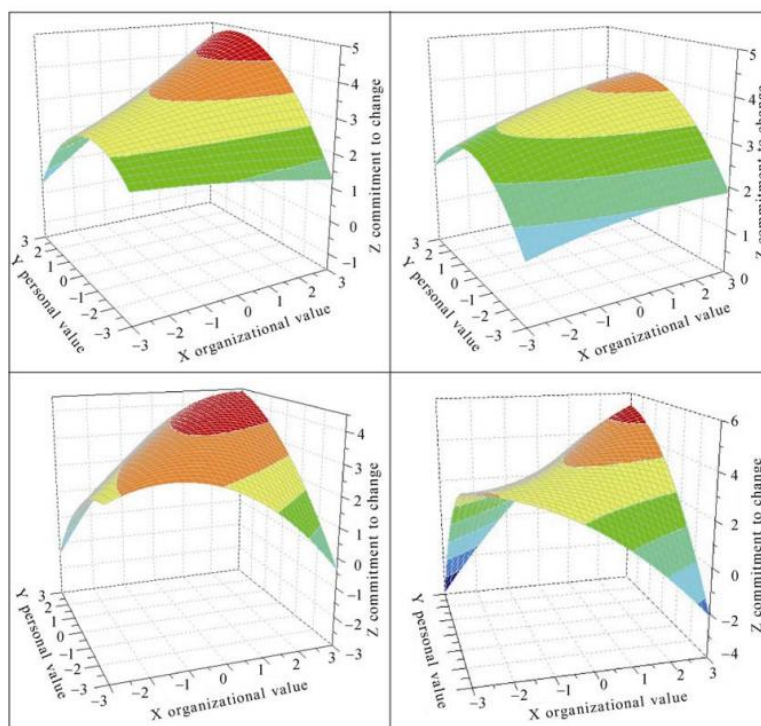


图 2 示例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调整了三维图的坐标轴，将 X,Y 轴转变为 $[-3, 3]$ ，Z 轴即挫败感调整到合适范围使得更为简洁直观，需要澄清的是由于本研究中一致与不一致的曲率均不显著，因此不存在上图中如此明显的 U 型特征(如陈倩等, 2022; 李树文和罗瑾琨 (2020); 许民利等, 2020 论文)，此外想呈现如上图中如此标准的三维响应图对于数据有着较大的要求。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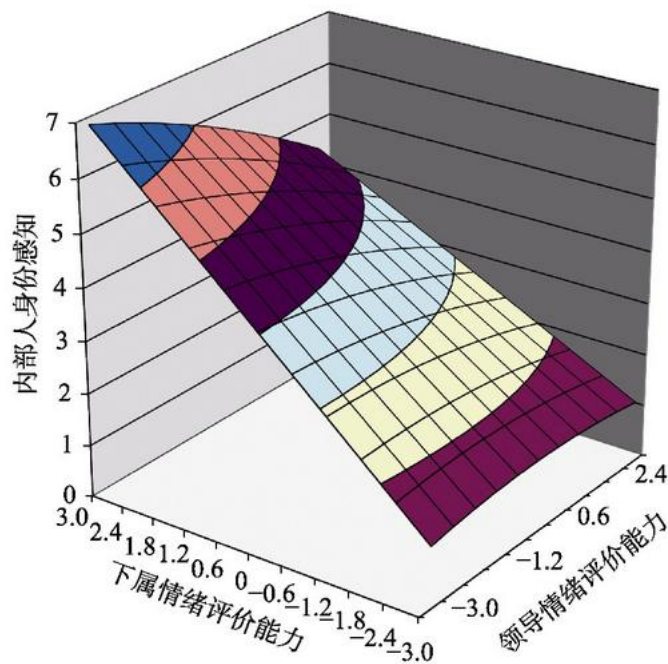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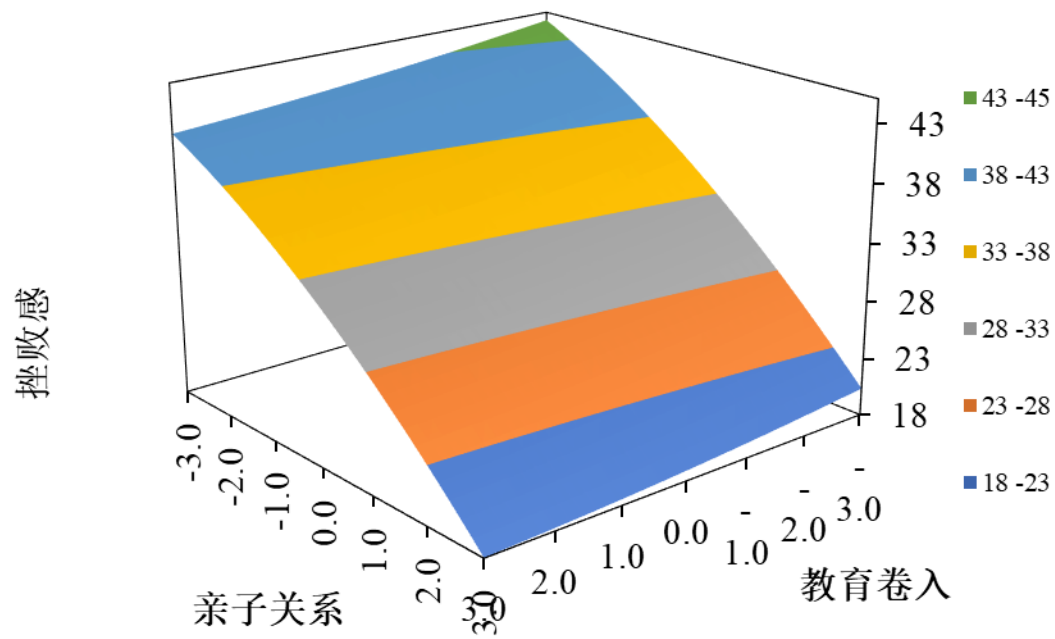


图3 领导-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对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影响 [下载原图](#)

图源李树文, 罗瑾琰(2020)

陈倩, 姜道奎, 刘腾. (2022). 忠诚、能力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 *教科学* 1-11

李树文, 罗瑾琰. (2020). 领导-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与员工建言: 内部人身份感知与性别相似性的作用. *心理学报*, 52(9), 1121.

许民利, 赵亚南, 简惠云. (2020). 基于任务技术匹配的“互联网+ 回收”价值共创行为研究. *技术经济*,

意见 4: 家庭经济状况勉强说是有序多分类, 但是婚姻状况应该不是有序的, 无序分类需要设置哑变量。以及家庭经济水平很好, 较好, 一般, 不太好, 非常不好是什么样的标准?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为更好澄清本研究中控制变量, 具体题目设置如下:

你的性别: ① 男 ②女;

你是否是独生子女: ①是 ②否;

你父母的婚姻状况: ①初婚 ②离异 ③再婚 ④其他

你的家庭经济条件: ①很好 ②较好 ③一般 ④不太好 ⑤很差

首先性别和是否独生为二分类变量, 因此未进行更进一步的处理; 其次有关家庭经济水平, 由于考虑到以具体经济收入水平划分一方面担心孩子并不清楚具体收入水平, 从而导致数据出错, 且容易造成施策过程中混乱现象; 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主观指标的合理性在于个体的行动源于对客体的认知, 主观指标对解释个体的行动往往比客观指标具有更好的效果(周菲, 余秀兰, 2016), 以主观性上家庭经济状态评价可能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更大且有效(Präg, 2020; Tomata et al, 2019)。而大量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等研究(张艳红等, 2020; 何微微, 邱黎源, 2016; 李宪印等, 2019; 施春华等, 2014; 张凤华, 2002)均以“很好, 较好, 一般, 不太好, 很差”为家庭经济水平划分标准。最后, 有关父母婚姻状况的划分也是有着较多文献支撑(兰杰等, 2017; 李实等, 2019; 李雪为, 2016), 虽然难以定义为有序分类变量, 但本研究也是按照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程度进行排序, 且许多研究亦是将婚姻状况纳入响应面分析(马丽, 马梦媛, 2019), 类似处理的变量亦有企业性质(齐昕等, 2019)、行业类型(张海燕, 张正堂, 2017)和单位性质(于维娜等, 2015)等, 但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 因此我们机会在未来的研究采取更为合适的方式以调查重要人口学变量。再次感谢您的细心指导!

张艳红, 朱小梦, 杨冉, 李永雪. (2020). 情绪调节与青少年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 132-144.

何微微, 邱黎源. (2016).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 1109 份调查数据. *西北人口*, 37(4), 37-44.

兰杰, 朱焱, 焦传家, 蒋红梅. (2017). 贵阳市大学生抑郁现况及其与生活事件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38(10), 1520-1523.

李实, 吴凡, 徐晓静. (2020). 中国城镇居民养老金收入差距的变化. *劳动经济研究*.

李雪为. (2016). *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 (Master's thesis, 湖南大学).

- 李宪印, 张宝芳, 姜丽萍.(2019). 大学生创新行为的构成因素及其实证研究. *教育研究*, 40(04): 91-100.
- 马丽, 马梦媛. (2019). 匹配还是不匹配? 需求-资源动态关系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1.
- 齐昕, 张军, 金莉娜. (2018). 组织二元性学习与企业竞争优势——基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 *软科学*, 6, 78-82.
- 施春华, 林云, 卢文奇, 王一茜.(2014). 南京市社区较年长者社会参与的调查研究. *Proceedings of 2014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SSR 2014 V6)*.,2014:31-36.
- 于维娜, 樊耘, 张婕, 门一. (2015). 需求-供给契合对组织认同影响的差异性研究. *管理科学*, 28(6), 65-79.
- 张凤华. (2002). 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参与意识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41(6), 118-121.
- 张海燕, 张正堂. (2017). 匹配视角的制度信任与供应链节点企业协作有效性——基于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法.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39(8), 56-70.
- 周菲, 余秀兰. (2016).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术性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学生·教师·课堂: 高等教育现代化——2016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2016:90-100.
- Präg, P. (2020).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predicts self-rated health irrespective of objective family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8(7), 707-714.
- Tomata, Y., Tanno, K., Zhang, S., Sakai, M., Kobayashi, K., Kurasawa, N., ... & Hiramoto, F. (2019). Subjective household economic status and obesity in toddler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daycare centers in Jap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9(1), 33-37.

意见 5: 一审意见中第 9 问, 作者并没有回答, 为何不采用构造两个回归的方式进行中介, 而采用块变量的方式? 块变量的缺点在于无法比较不同匹配情况下的中介效应, 而且这个块中具体是什么在起作用无法得知。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指导。由于我们的疏忽对一审中的第九问前半段疑问没有回应, 非常抱歉。为了更好地回答评审老师所提出的疑问、避免我们对问题存在误解, 请允许我们首先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梳理一下这一修改意见中可能包含的几点疑问: ①为什么要采用“块变量”进行中介以及其意义。②构造两个方程来进行中介可能可以讨论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的不同影响?

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中, 根据 Edwards 和 Cable (2009)的建议构建块变量进行中

介与调节分析是一个十分通用的方法，虽然不能全面阐释比较视角下变量间的复杂关系，但陶厚永与曹伟(2020)也提出对于有中介的多项式回归，目前的普遍做法是先形成一个块变量，能检验多项式回归的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确块变量很难比较不同比较匹配情况的中介效应，但同时其作为本研究中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一致的区集变量——块变量，相比于构建两个不同的自变量方程有着更为简洁和更有意义，且我们通览有关包含响应面分析的中介和调节建议，均采取构建块变量的方式进行分析(陈倩等. 2022; 李苗苗等. 2021; 李树文, 罗瑾琰, 2020; 刘鑫, 2018; 王汉瑛等, 2018(a) ; 王汉瑛等, 2018(a); 张海燕, 张正堂, 2017; 张兰霞, 王乐乐. 2021)。考虑到为更好的解释不同，我们以因变量抑郁为例仍构建两个方程(如下)，但这种方式抛弃了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的交互影响，即响应面分析的优势。

再次感谢您的指导与建议！

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 抑郁)				方程 2 (因变量: 挫败感)				方程 3 (因变量: 抑郁)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1	0.11	3.73	< .001	[0.11, 0.35]	0.04	0.65	0.51	[-0.02, 0.23]	0.18	3.56	0.001	[0.08, 0.28]
2	0.01	0.05	0.96	[-0.11, 0.11]	0.01	0.23	0.82	[-0.18, 0.07]	0.03	0.58	0.59	[-0.07, 0.13]
3	0.04	1.55	0.12	[-0.01, 0.12]	0.05	1.31	0.19	[-0.03, 0.11]	0.03	0.99	0.04	[-0.03, 0.09]
4	0.07	2.42	0.02	[0.14, 0.12]	0.19	4.42	< .001	[0.08, 0.24]	0.01	0.25	0.69	[-0.06, 0.07]
X	-0.42	-2.42	< .001	[-0.49, -0.35]	-0.07	-2.15	0.03	[-0.41, -0.29]	-0.22	-7.73	< .001	[-0.27, -0.16]
M									0.52	18.66	< .001	[0.47, 0.58]
W									0.05	-1.81	0.07	[-0.10, 0.01]
MW									-0.06	-2.60	0.01	[-0.10, -0.01]
R^2			0.20				0.15				0.46	
F			42.84 ***				30.53 ***				91.09 ***	

注：1 是性别 1 为“男”，2 为“女”；2 是是否独生子女 1 为“是”，2 为“否”；3 是父母婚姻状况 1 为“初婚”，2 为“离异”，3 为“再婚”，4 为“其他”；4 是家庭经济水平 1 为“很好”，2 为“较好”，3 为“一般”，4 为“不太好”，5 为“很差”；X 为自变量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的块变量；M 为中介变量挫败感，下同。

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 抑郁)				方程 2 (因变量: 挫败感)				方程 3 (因变量: 抑郁)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1	0.08	2.46	0.01	[0.04, 0.29]	0.10	1.63	0.10	[-0.02, 0.23]	0.16	3.05	0.002	[0.05, 0.26]
2	0.05	1.45	0.15	[-0.03, 0.22]	-0.06	-0.89	0.37	[-0.18, 0.07]	0.07	1.45	0.15	[-0.03, 0.17]
3	0.06	1.71	0.09	[-0.01, 0.14]	0.05	1.26	0.21	[-0.03, 0.11]	0.03	1.08	0.28	[-0.03, 0.09]
4	0.11	3.19	0.001	[0.05, 0.22]	0.16	4.04	< .001	[0.08, 0.24]	0.01	0.35	0.73	[-0.05, 0.08]
X	-0.01	-0.19	0.85	[-0.07, 0.63]	-0.35	11.17	< .001	[-0.41, -0.29]	0.04	1.62	0.10	[-0.01, 0.09]
M									0.60	21.85	< .001	[0.55, 0.65]
W									-0.11	-4.08	< .001	[-0.16, -0.06]
MW									-0.04	-1.89	0.06	[-0.09, 0.002]
R^2			0.02				0.03				0.42	
F			4.29 ***				5.83 ***				78.80 ***	

- 李苗苗, 田启涛, 关浩光. (2021). 服务型领导供求匹配一致性与创造力: 内在动机与主动性人格的作用. *科技进步与对策*, 38(20): 128-135.
- 李树文, 罗瑾琰. (2020). 领导-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与员工建言: 内部人身份感知与性别相似性的作用. *心理学报*, 52(9), 1121.
- 刘鑫.(2018). 消费者-服务员积极情感表达的一致性对重复消费意愿的影响. *消费经济*, 34(06): 62-67.
- 王汉瑛, 邢红卫, 田虹. (2018). 定位绿色消费的“黄金象限”: 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响应面分析. *南开管理评论*, 21(3), 203-214.
- 王汉瑛, 田虹, 邢红卫. (2018). 内部审计师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基于双重认同视角. *管理科学*, 31(4), 30-44.
- 张海燕, 张正堂. (2017). 匹配视角的制度信任与供应链节点企业协作有效性——基于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法.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39(8), 56-70.
- 张兰霞, 王乐乐. (2021). 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 *商业经济与管理*, 41(7), 15-28.

意见 6: 作者多次反复强调本研究考虑到了二元视角, 但是是针对不同变量的二元, 比如亲子关系只有学生知觉, 教育卷入只有父母知觉。似乎针对同一个变量的不同视角, 才更符合作者想要强调的二元视角的优势。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指导。首先,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 家庭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分, 对个体的发展有很大影响(Cairns et al., 2014; Hazel et al., 2014)。而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则一直研究者受到重大关注, 不论是理论研究或是实践证明, 亲子关系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 亲子关系这也是本研究在前期实验设计时确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孩子视角的亲子关系是顺其自然的确定, 但是在家长视角我们在多次商讨后认为, 正如前述回应 1) 由于家长与孩子身份的差异与现实地位的不同, 因此父母对亲子关系的认知往往是不符合或不准确的, 二者体验到亲子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存在甚至存在负相关; 2) 由于我国“双减政策”的落地, 学生学业压力减少, 时间也多了起来, 有偿支付的校外教育服务“课外补习”也愈发规范, 亲子监督、亲子活动和亲子沟通越来越重要, 父母教育卷入程度可以显著预测孩子健康成长, 且教育卷入是一个相对来说中性与实际调查反应, 父母真实作答的概率更高。因此未简单直接的选择父母视角亲子关系, 而是更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教育卷入行为。其次, 有关“二元”这一说法, 本研究原意是两种不同的视角的简要表述, 但仔细思考后, 这的确会引起读者的误解造成不好的阅读体验,

综合考虑后我们修改了相关表述，并将文中有关“二元”的陈述修正“不同视角”以达到更为准确和直白，并且我们计划在未来的研究在探究家长与孩子视角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综合影响。再次感谢您的细心指导！

意见 7：因为都是自评问卷，有效问卷的筛选也尤为重要，似乎作者只考虑到了匹配和缺失问题，没有考虑作答质量。是否有测谎题，以及事后的控制手段确保纳入分析的数据质量？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本研究采用自陈问卷，有效问卷的筛查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内容。而有关答题质量相关的控制手段，本研究中主要分为两种控制方式 1) **事前控制：**本研究未设置事前测谎题，主要是考虑到课题组在许多问卷测验实践中，测谎题在有些情景下可能不能发挥其测谎效果尤其是在心理健康测验时，还容易引起答题人抵触和警觉，因此未进行直接设置。但仍进行相关提升做题质量的方法 1 **分散测量：**无法从多来源获取数据时，可以从时间、空间和心理方面分离要测量的变量，在排版上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分离（本研究中将自变量和因变量题目分散），以及通过额外说明告知受访者测量的内容没有关联以此形成心理分离。2 **匿名作答：**本研究虽然采集了生日，但在隐匿题的保护下，且没有直接身份信息（姓名或学号）保护受访者的个人信息有利于受访者的真实作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赞许性的影响。3 **平衡题目顺序：**在问卷调查中，由于变量之间存在理论关系，容易使受访者产生联想并影响后续作答，平衡题目顺序有助于消除这种影响，且为了更小的不适感，将抑郁、自伤和自杀问卷由亲子关系和人生意义感隔开，避免连续的负性问卷测试。4 **改进题项的内容和作答格式：**单一的作答方式与选项（例如单一尺度——均为 5 点李克特尺度）容易使受访者形成机械作答的状态。本研究问卷在选择和平衡正向题与反向题的数量也可以使受访者保持良好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使用反应倾向进行作答。5 **增加受访者的作答动机：**为受访者提供礼物、作答反馈，或者告知他们此次调查将如何使其或其组织收益，可以提高受访者动机。本研究中每一名被试在完成问卷后都获得小礼物奖励（签字笔或小本子）。6 **高级管理层的动机：**与高级管理层进行沟通使其认可研究并协助进行数据收集是问卷调查领域里许多研究者的做法，本研究中课题组与学校高层领导签订合作意向书，由学校领导下达任务，测试过程得到班主任的大力支持，测试过程总体顺畅并配合。2) **事后控制：**1 采用三种共同方法偏差控制方法结果显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2 后续数据处理和分析：问卷数据由三名心理学博士在严格商讨处理方法后将流程一步一步贴出，再各自进行处理后相互验证防止处理过程的失误。再次感谢您的细心指导！

意见 8：作者说把缺失数据处理补充在附录中，建议在正文中补充简要缺失处理，如有更详

细信息则以附录为补充。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已将缺失数据处理内容补充再正文中。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第三轮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进行了修改，但是前述回应中一点值得商榷：作者回应婚姻状况为有序多分类的论证不充分，多分类作为协变量当然很常见，但是根据对儿童的影响程度把初婚、离异、再婚、其他四个类别当作有序多分类，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和统计学支撑，望仔细思考。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指导。首先有关婚姻状况的分类为初婚、离异、再婚、其他的依据是来源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其中 CHIP2002 问卷中婚姻状况分为未婚、有配偶、离婚、丧偶、其他；CHIP2013 问卷中婚姻状况分为初婚、再婚、同居、离异、丧偶、未婚；CHIP2018 问卷中婚姻状况分为初婚、离异再婚、丧偶再婚、同居、分居、离异、丧偶、未婚、其他。考虑到问卷是给孩子填写不存在同居情况，其次丧亲容易引起孩子较大不适，未在单列，综合思考后选择这四种类型。不仅如此，大量研究也采用这种类似的分类方式。如邓唯(2017) (初婚、再婚、单亲、其他)、龚玉莎等人(2020) (初婚、其他)、路肖肖(2017) (初婚、离异、再婚)、谢洋和陈彬莉(2021) (在婚、离婚、分居、其他)、曾子豪(2021) (初婚、离异、再婚、其他)、张红英等(2017) (正常、离异、一方或双方亡故、其他)、Lord 等人(2015) (在婚、离异)、Mandara 和 Murray (2000) (已婚、未婚(即未婚产子))、Park 和 Park (2020) (初婚、离婚、其他)。最后，我们仔细思考了我们上次回应“按照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程度进行排序”，虽然有研究显示后三种状态家庭孩子心理发展水平较低，但也存在过于武断，感谢您的细心审查！因此分类的类型是我们通览众多文章后综合考虑后的结果。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邓唯. (2017). 社会工作介入流动青少年的情感支持研究 (Master's thesis, 重庆大学).

龚玉莎, 时俊新, 丁慧思, 张敏莉, 康纯, 王开桥, ... & 邵宁. (2020). 武汉市中小学生人格特质及心理弹性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卫生研究*, 49(2), 173-178.

路肖肖. (2017). 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犯罪关系研究 (Master's thesis,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谢洋, 陈彬莉. (2021). 校园欺凌中不同欺凌角色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社会工作与管理*, 21(3), 5-14.

曾子豪. (2021). 儿童期受虐、主观幸福感、MAOA 基因和 THP2 基因对抑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Master's thesis, 湖南师范大学).

张红英, 王军, 李新影, 王宇宸. (2017). 父母婚姻状况和家庭氛围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及积极心理品质的调节作用. *广东医学*, 38(4), 598-603.

Lord, J. H., Young, M. T., Gruhn, M. A., Grey, M., Delamater, A. M., & Jaser, S. S. (2015). Effect of race and marital status on mothers' observed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in youth with type 1 diabetes.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40(1), 132-143.

Mandara, J., & Murray, C. B. (2000). Effects of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income, and family functioning on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

self-esteem.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4(3), 475.

Park, Y. S., & Park, E. C. (2020).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and types of suicidal behavior among Korean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53(6), 419.

编委意见：经两位审稿人多轮的审阅，该文质量有较大的提升，达到学报发表要求。推荐发表。

主编意见：文章经修改，质量较高，建议发表